

## 概念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概念史的研究在我国学界已历多年,且已成果显著。在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汇聚了一批当今概念史研究领域中有着一一定学术积累和成果的国内外优秀学者。会议期间的学术讨论涉及到深化概念史研究的多项话题:既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又有对以往概念史研究的总结性思考,还有对概念史研究发展前景的展望,更有对中国概念史研究特点的关注。研讨会的视角与所涉及论题引起了本刊兴趣。在国际化视野下,概念史的研究与问题讨论正在关注什么?中国近代学科建构对西方学科史理论的借鉴如何?东亚其他国家的概念史研究近况如何?如何认识与概念史关联密切的观念史文化视域?邀约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在此,对百忙之中参与笔谈的专家深表感激!海外学者文稿由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协助约请,特表谢意!

### 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

孙 江

如果打开汉语因特网,输入“概念”二字检索,一定会蹦出数以万计关于“概念”的信息。“概念”一词如此普及,乃至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其在逻辑学中的含义,都以为对概念有了“概念”(理解)。如果继之输入“概念史”一词检索,则会发现“概念史”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地被使用的词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著述之中:一类为《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所提倡的概念史,它强调德国概念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另一类是在翻译和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时,人们注意到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与德国的概念史方法相似。值得思考的是,与概念史一词相比,广为学者使用的是“观念史”或“关键词”[如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这可能与两本影响广泛的著作有关,一本是威廉斯的《关键词》(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本是洛乔易的《存在之链》(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日常所使用的“概念”,其内涵近于“观念”,在很多

情况下,一些冠以“观念史”、“关键词”的研究,其内容和概念史的旨向并不相悖。其实,细究起来,在欧洲语境里,概念史和观念史在研究方法上径庭有别,在概念史的提倡者看来,无论“关键词”,还是“观念史”,都没有如概念史研究一样区分语词的内涵和运用,因而在其研究中看不到“历史”[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4。汉译本参见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历史”(genuine histories)。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xi.]。

#### 一 概 念

19世纪中叶汉译西书曾对日本学习西方影响甚深,不到半个世纪,源自西方的各种新知识借助“和制汉语”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时人在生吞活剥地吸收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时,发明了各种速成学习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编写的《和文汉读法》一书[陈

力卫《梁启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沈国威编《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借助这一独特的学习方法，梁启超及其读者们得以广泛涉猎日语西学书籍。不过，如果要对《和文汉读法》吹毛求疵的话，其实问题不少。如，关于“概念”一词的释义，不知出自梁启超，还是哪位传抄者，竟望文生义地旁注道：“大概想念。”（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日本京都大学藏梦花芦氏本，第64页。“观念”则解释为“观而想念”，第90页）这一似是而非的翻译完全忽略了“概念”在逻辑学中的含义，也忽略了“概念”被生产的语词的历史。

概念/concept 一词源于拉丁语 *concept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把握、萌芽、构思及受孕、胎儿等。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省察》一书中使用过概念一词，但是，意欲以“直觉”和“演绎”来证明物质世界的笛卡儿对“观念”和“概念”并没有加以严格区分[René Descartes,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Oeuvres de Descartes: 7), Paris: J. Vrin, 1996]。一般而言，对概念最早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认为概念(*conceptus*)是表述(*representatio*)的产物，表述有感觉与认识之别，认识有直观和概念之分，概念则有经验概念和纯粹概念之异，纯粹概念又有悟性概念和理性概念(理念)之差。后世有关概念的讨论都是围绕康德的言说展开的[关于康德“概念”的讨论，参见近藤和敬《概念について》(连载“真理の生成”第2回)，《现代思想》2012年1月号]。

当 *concept*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英华字典》及其后继字典都将 *concept* 译为“稿”，在解释 *conception* 含义时，将其与 *notion* 并称为“意”、“意见”(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1823)。

第一个以“概念”(がいねん)来翻译 *concept* 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学者西周，西周受过严格的汉文训练，又有留学荷兰的“兰学”经历，他准确地捕捉了当时欧洲关于概念的界说。他认为，概念指从各个事物中抽取共同特点而建构的

表象，具有内涵(意味内容)和外延(适用范围)两个方面，由被称为“名辞”的词语来表示[石塚正英、柴田隆行编《哲学·思想翻訳語事典》，论创社2003年版，第34页，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汉语辞典》，日本明治书院2007年版，第88页]。1869年，西周在《学原稿本》一文中阐述了逻辑学原理——他称之为“学原”或“致知学”。他举例说，人们之所以未见而能知，可以在横滨讲述长崎的狗，在长崎讲述横滨的乌鸦，乃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狗和乌鸦的形象，借助这一形象得以知之。这个“知”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但还只是“直知”，只有不断累积“直知”，才能最后形成“念”(西周《学原稿本》，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宗高书房1981年版，第314~316页)。“念”有概念(*notion*)和想念(*idea*)两个层面，“概念”是“归纳之思”，“想念”为“推演之思”(同上，第317页)。1871年，西周在《五原新范》一文“念区概括”一节中，进而阐发道：概念是在了解事物的表征之后而形成的，概括不能完全究明事物的外形和本质；“想念”是想象力的产物，是通过直觉和直知将事物的外形和内容呈现于心中(西周《五原新范》，同上，第355~358页)。西周以“概念”一词翻译 *notion*，以“想念”一词对译 *idea*，涵盖概念和想念的“念”对译什么呢？西周在“念区概括”一节旁注中，注明“*conception*”、“*begriffe*”(begriff——引者)。1875年，在《致知启蒙》一文中，西周在重复上述关于狗和乌鸦的比喻后，在“念”后附注“*conception*”，而在关于事物“外形内质”的认识中，概念属于“度量观”(quantity)，观念属于“形质观”(quality)(西周《致知启蒙》，同上，第397~398页)。

在翻译“*conception*”一词时，西周有些踌躇，还同时发明了“理会”一词，可能觉得不如“念”，最后弃之未用。*concept* 涵盖 *notion*，西周把 *concept* 和德语 *begriff* 并列翻译为“念”，可谓用心良苦。方维规教授指出，*begriff* 自动词为 *begreife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页)。西周的“概念”和西周之后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后来流行至今的“概念”相当于西周的“念”，包含了西周所讲的“想念”即“观念”(idea)的意思。

1878年,美国人费诺罗沙(Ernest F. Fenollosa)受邀到东京大学讲授哲学,他在《政治学讲义》第三讲中称:“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概念”[参见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编《学问と知識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0),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357页]。其时,井上哲次郎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这个翻译应该说对井上哲次郎有影响。1881年,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汇》收录了这一翻译(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彙》,日本东京大学1881年版)。1887年,今井恒郎在译著《哲学阶梯》称:“观念由觉性而得,概念由悟性而得。”(ウエンツケ著,今井恒郎译《哲学阶梯》,春阳堂1887年版。原著:Von J. A. Wentzke, *Compendium der Psychologie und Logik: für die Gymnasien und Realschulen erster Ordnung*, B. G. Teubner, 1868)

虽然,“概念”作为哲学用语在1880年代即已在日语中扎根,但还不能说“概念”已经具有社会政治含义而广被使用。1874~1875年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明六杂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概念”,涉及思想、政治和文学的综合杂志《国民之友》在1888年一年内只出现过2次,1894年的《女学杂志》中出现过1次,著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8次(1895年)、11次(1901年),大约在1890年代中期以后,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成为在社会上流通并被赋予一定时代内涵的“概念”了。

《和文汉读法》将概念解释为“大概想念”,只是清末知识人学习日语时的小插曲。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在“释名”一节谈名学即论理学时称:“若个数物公性之总合,谓之概念。结合二个之概念,指定其间之关系者,谓之判定。指定两个以上之判定间之关系者,谓之推理”(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版,第75页)。概念出自“公性总合”,那么,“公性总合”又是什么呢?在“释教育”一节中,编者写道:“为心意之产物的表象,谓之观念,从个物抽出其共同之点,而生起共同观念者,谓之概念”(同上,第54页)。原来,“公性总合”就是“共同观念”,就是“概念”。《新尔雅》虽然准确地传递了当时流行的逻辑学意义上概念的意思,但是,汉语概念具有日语概念的问题,即“观念”和“概念”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在日语和汉语中,大概两个名词都侧重在“念”上——佛教语汇,故而

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陈文《名学教科书》,对于名学——逻辑学(logic)知识解释如下:“名学者,研究思惟之律令之科学也。”而思惟(thought)则是“以同时现于心中之二观念联结而发明其相属与不相属之心作用也”。接着,又写道,观念(idea)“由官体之感觉收为认识之形式,而为意识之主者也”。“人类一切知识,皆由观念始。未见汽船、汽车者,必不知汽船、汽车之为何状;未习英语、德语者,必不知英语、德语之为何声也”。而概念(concept)是“悬比多数观念之性而综合之也。如由梅、桃、樱等诸花悬比其通有之性,以构成非梅、非桃、非樱之一新观念,曰花。此新观念即为概念”(陈文《名学教科书》,科学编译部1911年编,第1~4页)。即,概念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

从以上“概念”一词在汉语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可知,翻译不只是词语对译,还涉及到意义和修辞等问题。翻译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概念“同一性”之认识,不同语言和概念之间具有可通约性。但是,从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关于翻译“不可能性”和分析哲学关于翻译“不确定性”可知,“概念”一词未必能准确传达 concept 一词的意思,更何况如本文开头所述,在实际使用时还衍生出各种歧异。于是,当一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包括“概念”在内的近代诸概念生产、再生产的历史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便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 二 概念史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词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比较《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哲学历史词典》[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et al.),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Schwabe, 1971~2007]、《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Rolf

Reichardt (et al.),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Oldenbourg, 1993] 这三部风格各异的多卷本巨著时,将“概念史”视为涵盖三者概念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术语”(a generic term)(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方维规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等相类,见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19 页)。在《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中,方维规简要介绍了德国的“概念史”亦即“历史语义学”模式、英美“观念史”模式、法国的“话语分析”或“概念社会史”模式,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概念史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 3 卷),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20 页]。

与德国概念史不同的是以波考克(J. G. A. Pocock)的“话语”(discourses)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意识形态”(ideologies)研究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为非历史的、神话研究,认为为了再现主体的意图,应该关注构成文本的语言习惯和作者/主体的信念,将思想史上的各种话语置于政治事件中考察(James Tully,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在这本书中,斯金纳的批评者讥讽他的研究反对以往思想史的“神话”,却创造了“碎片化的神话”)。对于“概念史”,斯金纳承袭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概念即工具”(concepts are tools)观点,强调要理解概念必须先理解与其相关的事物,因而不存在所谓概念的历史,而只有如何使用概念的争论的历史(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133)。尽管如此,里希特还是试图在德国概念史和剑桥学派之间牵线搭桥,他强调,剑桥学派和德国概念史关系密切,概念史方法可以应对英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变”,同样为思想导入了历史内涵。

笔者关注概念史方法是与对自身所从事的社会史研究的反省相关联的。在我看来,198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后,由于过度强调界域划分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社会史原本具有的“反命题”(antithese)特质黯然不显。鉴于此,我在十年前提出社会史研究“去理论化”和唤回“事件史”之主张(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当学者的研究“对象”——文本(text)与产生文本的语境(context)相互关联后,文本生成背后的情境便成为社会史的关注所在,文本自身的语言和构成则成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

其实,回顾法国“新史学”的历史,在其发轫之初就有人注意到词语的重要性。1930 年刊行的《年鉴》(Annales)杂志曾把“物与词”(things and words)作为其副题。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说:人在改变风俗习惯的时候,没有改变语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很早就存在了(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 Colin, 1993. 中译本《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针对学界在“观念史”、“关键词”、“新名词”和“概念史”等使用上缺乏统一,笔者曾撰文做过辨析(孙江《文本的终结与近代知识的发生:概念史的视角》,“国民国家的近代性及其文化制度”学术研讨会,成钧馆大学东亚学术院,2006 年 7 月 5~7 日。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 年 9 月 3 日)。根据科塞雷克的提示,可以将德国概念史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1. 概念史与语词史。单个语词都有明确意义,而概念未必有明确的意义。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述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

单纯的循环运动,从而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出一一定的紧张关系(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2. 概念史与观念史。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的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是,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关注社会的、政治性的词语,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3. 概念史与社会史。社会史研究以文本为手段,试图揭示文本中没有包含的东西;而概念史主要对文本和词语感兴趣。比如,社会史在研究社会团体、阶层、阶级之间的关系时候,往往超越具体的语境,揭示中期或长期的结构及其变化;而概念史本来源于哲学用语史、历史语言学和语义学等领域,是在对文本加以解释的基础上出现的研究领域。如此看来,所谓概念史就是关于词语的社会、政治史或曰社会、政治的词语史[《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了李宏图等四位学者关于“概念史”的笔谈,可知近期国内学者对概念史的理解]。

在德国执教鞭的小林敏明在关于日本现代思想研究的《主体的走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即在汉语哲学词汇里类似于主体/客体、主观性/客观性等带“体”和“性”等涉及身体语言的翻译甚多,比如“主体”是对 subjekt (subject)的翻译,但西周的这个翻译却是远离本来意思的“能指”(signifiant)游戏(小林敏明《〈主体〉のゆくえ——日本近代思想史への一視角》,日本讲坛社2010年版,第11页)。追根溯源,造成这种误译的源头在 subjekt 由以产生的西欧思想语境之中。小林的提醒,让我想起一句老生常谈:翻译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同一语言内的翻译,而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翻译则兼而有之。

### 三 中国语境

伯克(P.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一书中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化或实用知识,当这些知识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机制(academic es-

tablishments)而合法化”(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Polity Press, 2000, pp14~15)。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之不同。那么,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呢?

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1980年代末科恩(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和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势:中国效力的历史》一书堪称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的中国版,书中力证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中西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缺乏现代/后现代要素,于连从政治、文字和历史等角度研究“势”(运动性)概念后指出,以主体和因果关系为中心的欧洲思想发展到现代才开始强调差异性和动态,而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源头活水[François Jullien, *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 Seuil, 1992。参见中岛隆博日译本《势:効力の歴史—中国文化横断》,日本知泉书馆2004年版。于连在本书和其他著作中的观点,成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批评的对象(参见王论跃《法语儒学研究中的相异性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3日)。但是,笔者认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于连的思路值得肯定。毋庸说,用西方二元对立概念叙述的中国思想,不是“本真”的中国思想。与于连的运思不同,张寿安对围绕“乾嘉之学”的各种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对“乾嘉之学”条分缕析后,她认为18世纪出现的“专门之学”表明传统学术内部业已萌生如现代学术之“分科”,及至晚清,“经训之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崔适假江藩之名所撰《经解入门》一书将“经解”视为一种专门之学,从方法、资料到理论、目的都有清楚的界定(张寿安《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载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年版)。于连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无疑,

这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所未曾有过的尝试。撇开围绕现代性认知之不同,在讨论16世纪末以降中国内部变化时,人们无法回避与西方遭遇的历史,正是这一遭遇及其一系列连锁反应铸就了被称为“近代”的知识空间。各种西方语言文本被翻译为汉字文本,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译と日本の近代》,日本岩波书店2012年版。此书系二人关于翻译的对话),或“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刘禾《跨语际实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近年,学者们已经围绕一些重要概念展开了研究,有关“近代社会—国家”的概念,有革命、宪政、地方自治、民主、自由、共和、社会,等等,如上述小林关于“主体”概念的论述,概念史研究在词语上涉及同一语言内的翻译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如“大学”一词,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似乎最早使用[(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这位“西方孔子”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讲授过人文科学,巧得很,博洛尼亚是欧洲大学的诞生地,而当时所谓大学不过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修辞等,博洛尼亚大学外加罗马法,内容十分有限。艾儒略选择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学”来翻译 universitas,无疑有其考虑,这里暂且不论。拉丁语 universitas 原本是互助之意,后来演变为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在欧洲,“大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被翻译为汉语的“大学”最后真正能够对应近代西欧语言则是很晚的事情,来自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诚如与“大学”相关的词语还有“书院”、“大学堂”、“学堂”、“学校”等,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各个重要词语的历史进行深描,还要注意概念词源的复数性,有必要对构成概念的词语群加以研究。

一如概念史研究关心文本一样,要追究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有必要对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清末出现的翻译文本如《圣经》、《万国公法》、《国富论》、《天演论》等,创作文本如《孔子改制考》、《榷书》等,以往都有过比较深入研究。和上述“大学”概念相关,研究近

代教育离不开教科书。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对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在《奏定中学堂章程》里道:“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清政府还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同上书,第500页]。教科书文本的编纂方针、语言修辞和内容体现了权力的意志。关于教科书研究,如斯金纳一样,不仅要考察文本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何种叙述性意义(meaning)?更重要的还要挖掘作者语言和议论背后的写作意图。

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制度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制度化”。知识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借助语言来接受知识。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从概念形成的角度看,知识确实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但制度并非先验的,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批评结构决定论时所使用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制度化”——把捉过去、开启未来的“事件”(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dans l'histoire personnelle et publique; Le problème de la passivité; le sommeil, l'inconscient, la mémoire; notes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54~1955), Belin, 2003)。近代知识是在能动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就上述“大学”概念而言,与此相关的制度包括学校、分科、教科书制作等知识/权力装置。清末蒋维乔等编撰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八册)出版后,广受欢迎。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宗旨,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词写道:“是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用,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12年第14版,封底、封二)在黄龙旗易为青天白日旗、历史迈入共和时代后,蒋维乔等将上述教科书略作修订,更名为《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详解》(八册)继续刊行,该书广告

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傅运森《新历史》（一），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封二）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

“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 2012—06—30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高研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

### 一 “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begriffsgeschichte)，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

于20世纪60~70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8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15卷本《1680~1820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及其弟子赖夏特(Rolf Reichardt)。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79)，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

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

\* 本文最初是为201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而写的提纲，题为《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认知》。此次应邀参加笔谈，略有修改。